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83年7月
25
星期一
癸亥年六月十六
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间阴有小
阵雨 偏南
风向 偏东转
风力 二、三级
夜间 多云转晴
风向 南转北
风力 一、二级
温度 最高 34℃
最低 22℃

吉林省打出两口二氧化碳井

其中一口井日产气数千方，具有较高工业开采价值

新华社长春7月24日电（记者时光、通讯员郝毅）地质矿产部吉林石油普查勘探指挥所在吉林省安、德惠两县交界地区打出了两口二氧化碳井。这是我国东北平原第一次打出二氧化碳井。

这两口二氧化碳井深度分别为928米和12、507米。经测试，前一口井可日产气数千方，二氧化碳

含量达到90%以上，具有较高的工业开采价值。

二氧化碳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气体，它是制作啤酒、汽水等清凉饮料和生产尿素、纯碱的主要原料。

二氧化碳气经低温加压，可形成固体，即干冰。干冰不仅可用于食品的保鲜，也是人工降雨的催化剂。

据新华社上海七月二十二日电（记者余曦）上海吴泾化工厂的一项技术改造投资三十万元，创造利润一千元；技术改造投资十万元，仅十天内就全部收回，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效益。这个厂在华东化工学院、南京化工研究院等单位的技术协助下，以铜催化代替传统的铬催化剂生产甲酮，并相应改造了部分设备，使能耗降低了五分之一，产量增加了五分之一，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今年因此净增利润一千元。

技术改造投资三十万元
一年净增利润一千元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确定今后宣传工作重点

学习宣传《邓小平文选》帮助干部群众掌握建国大纲

学习好这部文选，可以加深对党的十二大文件精神的理解，不但对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指导意义。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记者李尚志）近日结束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认为，《邓小平文选》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国大纲，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会议确定，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是今后宣传工作的重点。

会议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于7月7日至7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长，中央各宣传、文教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仲勋、宋任穷等会见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同志，胡耀邦同志并就思想作风、领导作风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到会就学习《邓小平文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报告。

各地各部门首先要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通读，领会精神实质，为今年秋冬开始的整党做好思想准备。

会议讨论研究了如何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的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邓小平文选》集中代表了1975年至1982年这段时间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党和国家一些重要问题的见解，既表现了邓小平同志对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首创性，也表现了他集思广益、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民主作风。邓小平同志不但坚定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表现了高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且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不但忠实地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文选》中对党和国家这段时期内许多重大问题的阐述，不但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也使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有了坚强的思想支柱。总之，《邓小平文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奋斗目标，学习好这部文选，可以加深对党的十二大文件精神的理解，不但对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指导意义。因此，把《邓小平文选》的学习和宣传作为今后宣传工作的重点，是合乎党的要求、人民心愿的。组织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邓小平文选》，从中得到各方面问题的解答，以此武装大家的头脑，改进各方面的工作，这是宣传战线的重要职责。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今年下半年以至整个整党期间，一定要组织好《邓小平文选》的学习和宣传，以《邓小平文选》的精神指导整党和其他工作。下半年的各项工作、召开的各种会议都应围绕着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这个中心来安排。在各项工作中，各个会议上，都应把《邓小平文选》中的有关论述具体化。当前，各地区、各部门首先要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采取中心学习小组或短期脱产学习等形式，认真通读《邓小平文选》，领会精神实质，为今年秋冬开始进行的整党做好思想准备。

会议认为，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要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文稿、讲话结

合起来，例如，学习小平同志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可以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读一下；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可以把陈云同志文稿中的有关段落和篇章结合起来学习；整党中要和学习党章结合起来。

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指导

我们的各项工作，指导共产党员的言行。

党要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和今后宣传工作的其他问题。

会议指出，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这是党的十二大确定的目标和方针。精神文明又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要逐步做到协调发展。会议强调，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建设一定要先行，要统帅物质文明建设，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指导共产党员的言行。

会议要求宣传界、文艺界的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小

顺德县采取措施加强农村环境管理 防治社队企业污染保护农业生态

本报讯 通讯员黎尔宽、记者定通报道：广东省顺德县采取各种措施，解决社队企业的污染，较好地保护了当地历史上形成的塘人鱼生态系统，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社队企业也能健康发展，经济建设和环境建设实现同步前进。近两年，这个县社队企业又新增加569个，90%属于无污染或少污染的企业，全县社队企业总产值由1980年的3亿元，增加到1982年的5亿多元。占全县面积40%的水域，水质现在有了较明显的改善，从而保证了塘鱼等生

产不断增长。顺德县地处珠江三角洲中部的水网地带，鱼塘星罗棋布，桑蔗面积较大，是我国著名的商品生产基地。这里的农民用桑叶养蚕、蚕粪、桑叶下塘喂鱼，鱼塘里的塘泥又作桑、蔗的肥料，因而桑茂、蚕多、鱼肥、蔗壮，形成水陆相互作用、循环不已的良好人鱼生态系统。从1979年开始，这个县的社队企业高速发展，工业“三废”增多，空气、土壤和一些河涌、鱼塘受到污染，给桑蚕、塘鱼、甘蔗生产带来不利影响，有的还造成了严重

的损失。县委、县政府领导从这些事实中看到，重视经济发展，不解决污染环境的问题，不仅不能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而且会严重地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祸及子孙，后患无穷。1981年5月，县委、县政府决定成立县环境保护办公室和县环境监测站，并逐步在社队和部分企业形成了一个环境保护工作网。环境保护部门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通过调查摸清了社队工业的现状、污染源和农业生态环境的变化，为县里

有计划地加强农村环境管理打下了基础。

康，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青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会见时在座。

访华团还将前往我国东北访问。

邓颖超会见日本创价大学第四次访华团

中日友谊要象樱花枝繁花茂年年开放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颖超今天上午在会见日本创价大学第四次访华团时说，希望中日友谊象樱花一样，枝繁花茂，年年开放。

邓颖超看到代表团50多位成员中绝大多数是朝气蓬勃的大学生，高兴地说：“今天同你们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

以小室金之助教授为团长的创价大学访华团是前来到北京，昨晚为首都青年演出了以歌颂中日友好和纪念已故周恩来总理为内容的古筝、钢琴幻想组曲《周樱》，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

邓颖超在会见时对创价大学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发展中日友好所作的

努力表示赞赏。她说，中日友好源远流长。两国人民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在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今天仍然怀念那些为中日友好作出贡献的各界人士。

邓颖超语重心长地说，中日两国人民都认识到，过去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我们都愿意中日友好永远发展下去，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关系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她说，中日友好的道路是非常宽阔的，两国在经济上要加强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也应互相支持。

邓颖超的亲切话语，激起了日本朋友的阵阵掌声。小室金之助教授代表大家祝愿邓颖超身体健康。

康，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青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会见时在座。

访华团还将前往我国东北访问。

邓颖超会见日本创价大学第四次访华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康，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青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会见时在座。

访华团还将前往我国东北访问。

邓颖超会见日本创价大学第四次访华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康，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青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会见时在座。

访华团还将前往我国东北访问。

邓颖超会见日本创价大学第四次访华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康，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青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会见时在座。

访华团还将前往我国东北访问。

邓颖超会见日本创价大学第四次访华团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和陈云同志《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这三篇文章，特别是党员文艺工作者，要把学习这三篇文章与学习党章结合起来，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会议指出，我们的建设事业需要各个领域、各门学科的很多专门家，在我们的专门家太少，需要进一步建立起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专家队伍，也需要从其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但是，不管是什么专门家，不管他的成绩多大，入党以后要始终想到自己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按党章办事，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会议指出，党要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包括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宣传部门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加强对文艺战线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教育和管理，批评和监督。只要我们的党员文艺工作者按党章办事，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可以说就基本上解决了。为了克服文艺方面思想政治上软弱涣散，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宣传部门要按照党章对党员文艺工作者进行管理、监督和教育。这是党委宣传部门的份内工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会议要求作为各级党委工作机关的各级宣传部门，要在思想战线上当好党委的参谋、助手和哨兵，了解思想动向，发现倾向性的问题，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议，并且在党委的领导下，承担起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向人民群众灌输科学共产主义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各级宣传部门的同志要牢固树立全局观点，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前首先要学好《邓小平文选》。

与会同志在会上交流了各地宣传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决心为进一步开创宣传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

殖业为基础的无污染或少污染的行业，严格控制污染型行业的发展，抓紧重点污染源的治理。现在全县工业企业中，无污染及少污染的企业已占到总数70%以上。

顺德县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本县实际情况的环境管理制度，建立和健全了环境管理机构，对社队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和治理污染等，都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和明确的办法。现在，这个县逐步形成一个群众与专业相结合的环境监督网。

反映老帅军旅生涯三本书出版
邓小平为《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题写书名

反映老帅军旅生涯的三本书，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六周年之际，由战士出版社出版。军委主席邓小平为其中《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一书题写了书名。另外两本书是《刘伯承中原逐鹿》和《陈毅北渡》。

《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记述的是罗荣桓同志青少年时代和他在红军中的事迹。

《陈毅北渡》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同志率领新四军一部从苏南敌后北渡长江，驰骋苏北，与敌伪顽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成功地开辟抗日根据地这一历史功绩。

《刘伯承中原逐鹿》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挥师南征北战的卓越军事才能和高超指挥艺术。

（据新华社）



打破因循守旧 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兖州矿工程进度快质量好

编者按：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是搞好重点工程建设的一项有力措施。兖州矿的情况说明，建设成果的大小、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行生产的技术水平的高低。打破因循守旧，用新的技术和工艺代替陈旧的、落后的技术和工艺，就会大大提高企业或工程的经济效益。

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时锋报道：我国重点建设工程之一的兖州矿区，在建设中心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加快了工程进度，提高了工程质量。从1981年以来，共推广先进经验和革新成果115项，其中受到省以上科技大会表彰的有13项。

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是从关键工程并施工开始的。并施工一般占整个工程工期的40%左右。这个矿区煤炭埋藏深，最深达800多米，比通常矿井深两倍多，所占工期比例更大。矿区科技人员在全国10多个省市有关科研部门的协助下，认真吸收国内外当代施工的先进经验，大胆提出了并筒施工表土段冻结注浆的方法，把由并筒内排水，改为并筒外部封水的办法，使并筒掘进平均工效比国家规定的定额提高55.8%。接着，他们又先后采用了一系列立井综合机械化配套凿井新技术，先后几次创出省内和全国月成井最高纪录。

这个矿区用混凝土锚喷支护代替料石砌壁，砌碛巷道又快又好。一座年产45万吨的北宿矿井在1.7万多米长的巷道采用这种方法，节约木材2,200立方米，钢材610吨，缩短工期半年，成为我国第一座锚喷支护井，获得了省煤矿科技优秀成果一等奖。后来，他们在锚喷支护上进行了新的改进。把这一成功经验用在年产300万吨的兴隆庄大型矿井中后，使4万多米巷道工程，缩短工期一年左右。

在土建与地面安装工程施工中，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创造了内外立体交叉滑模新工艺，一次组装滑升成功，节约投资14万多元，缩短工期90天，工程质量优良。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赞扬，获得1983年省煤炭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

既满足了国家需要 又提高了经济效益

天水红山试验机厂大力开发新产品

据新华社兰州7月24日电（记者敏钟杰）甘肃省天水红山试验机厂大力开发新产品生产，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今年上半年，这个厂的产值、利润在连续两年实现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又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倍和5倍。

天水红山试验机厂，是我国生产力学测试、试验仪器的专业化企业。目前，这个厂的产品已由原来的19个品种发展到90多个品种，新产品的产值占总产值的70%以上。他们研制成功的具有先进水平的43个新产品中，有五种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四种获1978年和1982年一部部科技成果奖，两种获1980年国防科委科技奖。

天水红山试验机厂，重视开发具有先进水平的新产品，既满足了国家需要，又提高了经济效益。如10吨高频疲劳试验机，去年生产了15台，今年可生产20台，每台利、税10万元。他们研制成功的150吨电液动态轨道衡，广泛应用于化工、铁路、煤矿、冶金、建筑材料等工业部门。1982年生产了11台这种轨道衡，今年计划生产17台，每台利、税达5万元。这个厂去年下半年靠这两个新产品提高了经济效益，获得利润127万元。今年又开发了18种新产品，上半年总产值达到575.9万元，实现利润110万元。



四川荣经县农业局、畜牧局、县科协等单位联合举办农业科学技术询问站，到集市上解答农民提出的技术问题。一年多来，他们逢集必到，被群众称为“农民的知心朋友”。

农户也要搞好经济核算

浙江省金华地区农委 张柏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户家庭要不要搞经济核算？根据我们最近在永康、金华等地的调查，回答是肯定的。家庭规模的生产经营，具有聚散分散生产资金，发扬精耕细作传统技艺，充分发挥个体经营积极性等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不会自动地发挥出，只有人们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加强经营管理，才能达到增加生产，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特别是随着农村各种专业户的兴起，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户家庭实行经济核算，更加显得迫切和重要。

因为有的专业户要同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单位或农户发生经济往来，债权债务牵涉面广，如果不搞经济核算，实行科学管理，就无法开展经营活动，更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正如有的农民说：“若要富，搞好核算和财务”。

所谓农户家庭经济核算，指的是用货币形式，以农户家庭为单位，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和生产经营成果，进行记录、计算和分析，达到用较少的劳动消耗，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实践证明，农户家庭经济核算与不搞经济核算，效果大不一样。金华市多湖公社雅张大队养奶牛专业户叶绍全，家庭设有日记帐、分类帐，

两火车皮蕉柑一斤也没批发给国营零售店

哈尔滨果品站竟让少数商贩垄断市场

《市场》报发表社论说：经济要搞活，不能搞乱

本报讯 据今天出版的《市场》报报道：前些日子，正是水果淡季，黑龙江省哈尔滨果品采购供应站从广州调进两火车皮蕉柑。该站连一斤也没批发给国营零售商店，竟将其中一火车皮54,375斤全部卖给站外区的15个水果商贩，另一火车皮交给本单位所属的青年商店经销，也大部分卖大号给了个体商贩。这批蕉柑货源基本上被个体商贩垄断，他们以缺为贵，哄抬价格。据市物价局调查，闹市区个体商贩摆卖的蕉柑每斤1.50元，比规定零售价0.52元，涨价53%；偏僻市区商贩的蕉柑每斤卖1.80元，比规定零售价高0.82元，涨价84%。对此，消费者强烈不满。哈尔滨市物价局经过调查，4月份通报批评了果品采购供应站。这个果品采购供应站的个别领导人拒不接受批评，还说什么：不是说经济要搞活，要放开嘛，我们愿意怎么卖就怎么卖，为什么不可以卖给个体商贩。

《市场》报就此事发表题为《要搞活，不能搞乱》的社论说：真要搞活经济，群众举双手赞成。问题是象他们这种作法，不是搞活了，而是搞乱了。在国营零售商店无货可卖的情况下，把整火车皮的蕉柑批给十几个商贩，让个体商贩垄断货源，任意卖大价，冲击了计划市场，结果是多数人吃亏，少数人得利。包括批发在内的国营商业是商业各种成份中的主体。搞好市场供应，满足群众需要，稳定市场价格，维护消费者利益，是国营商业的根本职责。个体商贩所以能买到紧俏商品卖高价，与某些国营单位经营思想很有关系。

姚依林副总理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但不允许以搞活经济为借口坑害国家，损害消费者利益。”国营商店的职工必须端正认识，把满足群众需要放在第一位。严重违法乱纪者，应依法受到惩处。

各展其长 勤劳致富

遵化县做好帮贫扶困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王力报道：河北省遵化县县委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全县仍存在一些生产发展缓慢、经济收入较低的社队和困难户，于是积极采取措施，帮助这些后进社队和困难户各展其长，勤劳致富。洪山口公社地处深山，生产比较落后，去年人均收入不足80元。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到这个公

农牧渔业部重视专家意见 通报各地制止滥造混合肥料

本报讯 农牧渔业部重视专家意见，于最近通报各地：一些社队和单位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套购国家肥料，粗制滥造混合肥，骗取农民钱财，造成极坏影响，必须严肃处理。向农牧渔业部反映意见的是华中农学院、湖北省农业局土肥站、农科院土肥所的陈华葵、李建勾等九位土壤肥料专家、教授。据他们反映，湖北省一些社队用国家供应的商品化肥粗制滥造混合肥，高价卖给农民，牟取暴利，既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又使本来供应紧张的化肥，由于滥造混合肥遭到浪费。

专家们提出，国家计划供应的复合肥料和混合肥料是经过一定工艺的精心浓缩肥料，有效成分总含量高，如三元复合肥含氮磷钾总养分达45%，磷酸二铵的氮磷总含量平均为74%；而某些社队化肥厂，设备简陋，只是把国家供应的氮磷钾肥搞来，用搅拌机或者用锹加拌制成，有效养分不仅没有增加，反而降低。如湖北沔阳县张沟化肥厂生产的一吨混合肥要损失氮素20斤，相当于白白浪费掉碳铵100多斤。

通报还强调指出：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化肥的分配管理和计划供应工作，加强科学施用化肥的宣传和技术推广工作。

万载县为专业户建立畜禽良种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袁宗报道：江西省万载县积极为专业户建立繁殖畜禽的良种基地，专门提供种源，引进良种。

今年以来，全县共建立母猪良种基地、鸡苗基地等15个，为1.2万养殖专业户提供母猪6,200头，引进鸡苗10万只。

素有传统优良种猪产地的岭东公社，自定为种猪基地后，不但保证了本地母猪良种化，还支援了外社外队不少良种，平均每3.5户有一头母猪，比去年同期增长26%。

另外，县食品公司还拿出4万元资金与社队挂钩建立了一批良种基地，支援了赤兴等7个公社专业户的饲养业。

分别登记各项收支和经营往来。由于经济核算搞得好，科学地进行了投入产出分析，他在去年养的这两头奶牛每头平均纯收入3,400元；年产小牛两头，每头价值1,000元；而成本开支只占总收入的26.4%。相反，这个市的东郊公社周村大队养奶牛专业户周金贵，收支不记帐，成本不核算，不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只知道产奶，不知奶牛产奶高，哪头牛产奶低。去年，他养的这四头奶牛每头平均纯收入2,250元，比叶绍全要低33.8%；年产四头小牛，每头价值950元，比叶绍全要低5%；而成本开支占总收入的30%，比叶绍全要高3.6%。以上情况表明，农户家庭实行经济核算，是农村经济管理中的一项重大突破，有利于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家庭经济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那种认为实行家庭经营后，“炒票在自己袋里”，“东西在自己家里”，不必进行经济核算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对的。

河池地区帮助少数民族脱贫致富

据新华社南宁7月24日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采取措施，帮助贫困的兄弟民族社队改变落后面貌，受到这些社队各族人民的欢迎。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地区抽调7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了最困难的215个大队，向社员宣传党的政策，传授先进技术，落实责任制。

干部要把贫困户的冷暖放在心上



农村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特别是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但是，无论什么地方，包括比较富裕的地方，总是相对的有一些收入较低的社队和困难户。这些社队和困难户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是农村集体经济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我们鼓励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同时是为了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农民富裕起来。各级领导干部，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这部分困难的社队和农户，一定要把他们冷暖放在心上。

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在农村有的干部认为，“社员包了产，生产生活不用管”。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劳动组织形式改变以后，社员的生产

和生活，特别是一些贫困社员的生产和生活，不是不需要管，而是应该管得更具体、更细致一些。所谓管，就是要做好各项生产服务工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贫困的社队和农户，有的自然条件差，家底薄，生产门路少，信心不足，需要有关领导深入宣传党的政策，扶贫先扶志，使人们树立勤劳致富的信心。有的社队和农户是缺乏资金、缺乏生产资料，有的不懂科学技术，有的不善经营，有的遭到了意外的灾害，等等。有关领导干部要深入下去，摸准情况，对症下药，有效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领导干部具体扶贫扶困很重要，有利于组织各方面力量，相互配合，把工作落到实处，比较快地做出效果来。遵化县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是可行的，可资各地借鉴。

农村专业户可否不种责任田？



我家四口，养了50箱蜂。去年，卖给国家蜂蜜5,000多斤、蜂王浆50斤，纯收入5,000多元。最近，被县人民政府批准为养蜂专业户。我家今年养蜂已经增加到100箱，因人手有限，自家承包的责任田管理不过来了。为此，我去县政府说了这个情况，要求不种责任田。县里解释说，国家还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如果不种责任田，你们吃饭问题无法解决。我听后觉得也有道理。但是，象我们这样的专业户，一边种庄稼，一边养蜂，结果是两方面都受影响。请报纸给我们解答，是否能让我们这样的专业户少种或不种责任田呢？

河北省遵化县夏庄公社北湾大队 赵有仁

赵有仁提出的问题，我们请农牧渔业部政策研究室作了答复。

——编者

赵有仁同志：

随着农村商品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各地有不少从事养殖、加工、运输、销售或其它多种经营为主的农户，提出了不承包耕地的要求。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农户之间转让承包耕地的做法。这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出现的新问题，需待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妥善的办法来解决。

耕地的相对集中，是农村向专业化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些地方的一些专业户，为了集中经营某项专业，征得生产队同意后自愿将原承包耕地的全部或部分交回生产队统一调剂，而另一些以从事种植业为主的农户，则扩大了承包耕地的面积，其中的成为种植业专业户。目前，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政策规定，一些地方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大体上有如下一些做法：

1. 坚持土地公有，不允许买卖、出租，不得荒废承包耕地。
2. 对于要求退出承包地的专业户或中间户，最好鼓励他们把地退给生产队耕种。这样，能把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的手里，也有利于合理规划利用。
3. 生产队和退地户，要签订合同，保证他们的口粮供应，或者在一定时期后再需要土地时，可以重新包到土地，以解除他们的顾虑。
4. 为了鼓励商品粮专业户合理利用增包的耕地，规定在需要收回这些地时，要对商品粮专业户使用期间为改良土壤、增加设施等所花费的投资给以合理补偿。
5. 关于退出承包地的口粮问题，各地解决的办法也不一样。有的退地户只退责任田，不退口粮田；有的全部退出承包地，由接收社队承担退地户的粮食；有的是把地退给生产队，口粮由生产队解决；有的是退地户自己解决口粮。总之，各地情况不同，要根据实际情况，商定妥善解决办法。

土地的适当集中，将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当前还要着重于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操之过急，更不允许用行政手段去强迫命令，拔苗助长，必须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 农牧渔业部政策研究室

“黄老您好！”我满怀崇敬之情，紧握黄老的手，向这位老革命家致意。

“好，好。”黄老亲切地示意我们坐下。黄老的慈祥和蔼，驱走了我心中的几分拘谨。

黄老穿着一身蓝色制服，旧得已经变成灰白色；一件褐色的绒线衣，下襟和袖口已经磨坏；脚上的一双青布鞋，鞋底也磨起了飞边。我的目光停留在黄老右手旁的那个茶缸上：这个普通的白搪瓷缸不知用了多少年月，已经几处掉瓷，黑白相间，用一块铁皮把缸盖回扣连接在一起。

黄老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是最早上井冈山的老革命家之一。他1928年就担任了红军第四军三十五团团长，曾是七届、八届中共中央委员，是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解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黄老实事求是地提了一些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黄老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打击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老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了中纪委常务书记。现在，黄老已八十一岁高龄，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职务。岁月的风尘染白了他的双鬓，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斗争、工作的艰辛，夺去了他的视力。然而，在他那清瘦的面容上仍留下当年的坚定和刚毅。

“有问题你们就提吧。”黄老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我们请黄老谈谈解放战争时期在西满的工作和战斗情况。

黄老的记忆力很好。他回忆了抗战胜利后不久，

“无人民，无生存”

——访老一辈革命家、中纪委第二书记黄克诚

黑龙江《党的生活》记者 卢殿学

毛主席电令他带部队向东北挺进，主持西满分局的日常工作，以及当时剿匪、土改、恢复经济建设、建立各级政权和扩大人民军队等方面的情況。

黄老感触很深地说：“东北的解放，就是因为发动了群众，有了群众基础。”当时以李富春同志和黄老为主要领导人的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在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还不了解，没有根据地，没有给养来源和遍地土匪等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把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作为一项根本任务。部队刚打下齐齐哈尔，西满分局就提出，要立即使这个遭到敌人破坏，还充满着硝烟味的城市电灯亮，马路净，下水道通，受到各界人民的拥护和赞扬。联系群众，不脱离群众，是当时对所有干部的一条根本要求。当时，还派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黄老亲自向干部们作动员，要求他们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同甘共苦。干部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跟（给）劳苦大众抗大敌！”“劳苦大众没吃穿，就象自己家里没吃穿！”“劳苦大众受人欺，就象自己的亲兄弟受人欺！”广大干部身体力行，同人民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关系。有一次，分局组织部长古大存同志到肇州县发动群众，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南方口音的古大存同志换上了马夫的衣服，使他得以脱险……

这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历史一幕！我请问黄老，当时为什么能做到同群众有那样的血肉关系？

黄老不假思索地说：“这是毛主席的长期教导。没有人民群众就活不下去，就生存不下去。”黄老加重了语气：“不管什么人，只靠军事力量是活不下去的！军队没有人民群众不行，党没有人民群众也不行。党是从群众中产生的，没有群众，党就是空的！”

聆听着黄老这些充满历史唯物论的朴素无华的语言，我不由地说：“老一辈革命家对这点认识很深，但现在有些人却淡薄了！”

“这是个危险。”黄老的思绪从历史转到了现实，不无忧虑地说：“党脱离群众，有人谋私利，搞发财，顾不得群众，同群众冲突了。儿子、房子、车子，搞那些东西去了。群众侧目而视！”最后几个字，黄老说得很重，看得出黄老轻轻地咳嗽起来。

“党内潜伏着一个危机：不关心群众，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小团体、个人、家庭、亲属。这不是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个人谋私利，革命就谈不上。”

由于激动，黄老轻轻地咳嗽起来。黄老的话，使我们陷入了沉思。“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仅反映着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关系到党的生死

存亡。我们的老革命家怎能不强烈关心，为之动容呢！

我打破了这短暂的沉默，说：“对搞好党风，大家还是有信心的；有党中央的决心和正确路线，有老一辈革命家健在。”

“有信心就好。”黄老插了一句，又感慨地说：“老革命家也老了。”

然而，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我们搞好党风的中流砥柱，是全党端正党风的楷模。

黄老说：“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好党员、好同志要与坏人坏事作斗争。”黄老以极为关切的心情谈到了有些地方在机构改革中突击提干的问题。黄老说：“我们依靠老同志，在党内三四十年就老同志们了。老同志有起好作用的，也有起坏作用的。不顾全局的人也不少！”说到这里，黄老说：“你的乐观态度（指我说的对搞好党风有信心）我赞成，但要做好多艰苦工作。党内坏人坏事不少。有的人不愿做模范，怕得罪人，保乌纱帽，保选票。这不是革命的想法，是个人主义的想法！”

我如实地对黄老说：“怕得罪人在干部中相当普遍。”

“怕得罪人，坏人坏事就没人管，好人吃不开，坏人吃得开。什么坏事都有人做，社会主义没有的都有了。”黄老话语谆谆，“不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好人好事就树不起来。一个地方，树好人好事，必须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不能搞同时树人这个，是长期斗争的问题。”我默默地点着头。

同黄老在一起，仿佛时间的节奏加快了许多，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我别情依依，紧紧地握着这位老革命家的手，发自内心地说：“黄老，祝您健康长寿！”

争取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遵义地区工商局长席常安等被撤职查办

地区收容所所长杜昭穆由公安部门依法逮捕，其他人将依党纪国法分别进行处理

本报讯 据《贵州日报》6月27日报道：遵义地区工商局长席常安等人执法犯法、诈骗钱财一案，最近受到了严肃处理。中共贵州省委批准遵义地委对席常安撤职查办的处理意见，由政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杜昭穆由公安部门依法逮捕，其他人将依党纪国法分别进行处理。

现已查明，1981年3月，席常安伙同地区收容所所长杜昭穆，以办理所谓“化肥案”搞了700吨尿素假提货单，欺骗买主。而后，席杜又与地区工商局副局长俞有章、地区公安处副处长邵金玉等人，公然采取制造假证，利用诈骗分子土装成卖主，引入上钩的违法手段，进行诈骗。从1981年3月至1982年2月，共骗取人民币34万余元，收买机两台，手表两块，并非法收容审查五人（六

次），有的被非法关押长达62天。在非法搜查买主住处中，强行取走现金4,250元。他们从上述非法没收的款项中，作为罚款收入80,465元，从“发奖”用去11,060元，吃喝开销1,207元。被騙上当的买主都是无辜农民。

《贵州日报》同时以《从“化肥案”应吸取的教训》为题发表了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天光化日之下，我们队伍中的某些违法犯罪分子，干这种违法犯法、祸国殃民的事，同旧时代的贪官污吏有什么区别？党和人民难道能够容忍他们胡作非为而不加以严惩吗？”

社论说：“席常安等人东窗事发、马脚露露已有一年，他们的理由有：为什么此案长期搞不下去，久拖不决？应该指出，此案处理久拖不决，与遵义地委前段态度不够坚决，抓得不紧，

同时我们上级领导也检查督促不够，有直接关系。”社论还指出：“应当通过对上述非法没收的款项中，‘化肥案’的处理，从组织路线上、干部政策上，对各机关尤其是专政部门的组织状况进行一次检查整顿。通过检查整顿，对文革中的‘三种人’，对抵制、怀疑中央路线的人，对严重违法犯罪的人，现在还居领导岗位的，要坚决撤下来，触犯刑律的必须依法处理。决不能姑息养奸。”



齐齐哈尔铁路局白城铁路分局工务段退休干部、省劳动模范、共产党员李志唐，今年七十七岁。他退休后继续努力为党工作，带领两名女工对站内、机务段散落的废旧配件进行了清理，分类堆码、编号，建立了账卡。同时，变废为宝，为国家节约了大量钢材。今年4月，李志唐被白城分局树为“一心干四化的退休好干部”。

吴惟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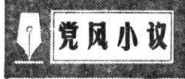


想起焦裕禄的一句话

方文

中共湖北省委不久前通过了几项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规定，其中一项是：个人的重要讲话，报告，一律要亲自动手起草；以领导机关名义发出的重要文件和代表省委作的重要报告，一律由领导者亲自指导和主持起草。这个规定可谓“切中时弊”。靠秘书代笔，是某些领导干部的“通病”。如果念的稿子是秘书书写的，稿子的意思也是秘书想出来的，自己不是显得太懒惰了么？

焦裕禄同志说过一句受到很多人赞赏的话：“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细察其意，就是强调领导者要多动脑筋，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这样，方能取得指导工作的发言权，拟出切合实际的工作方针，说出令人折服的道理。我以为，那些不愿意自己动手起草讲话、报告的领导干部，恐怕主要是因为文字表达水平不高，而是缺乏一种躬行实践的精神，缺乏对实际情况的透彻理解。心里没数，脑中空空，于是只能念别人的稿子。焦裕禄同志的那句话，强调的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倡一种革命精神。有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有勤政不息的革命精神，就能把我们各项工作的各项做得好些。



该刹刹机关公文的长风

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有分析概括的才能和理论水平；另一方面，需要有较高水平的文字表现能力，才能写出观点鲜明，言简意赅的文件，使其真正起到指导作用。

因此，“刹长文，兴短文”，实际是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才能的问题。

福昆

认真开好党的民主生活会

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在生活上，肯定成绩，表扬先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利于及时纠正缺点、错误，增强党员的组织观念，提高党的战斗力。北京《支部生活》最近刊登的大华村几位党员在生活会上的发言，敢于触及思想实际，值得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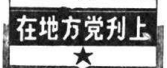
——编者

争取在整党中取得“合格证”

最近，我在征求群众意见时，有人对我说：“你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想了想，确实是这样。比如，有一段时间我对党的一些政策不理解，就跟着群众随便议论。生产纪律也比较松懈，不到下班时间，就跟着人流提

思想慢慢滋长起来。今后我一定按照新党章的要求，好好学习，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改造世界观，确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争取在整党中取得“合格证”。

孔繁新



为真理献身的蔡和森

1931年3月，蔡和森同志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就在这时，曾亲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蔡和森同志比较熟悉的叛徒顾顺章也跟踪到香港。

6月10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蔡和森赴会前亲了亲小女儿的脸蛋，对妻子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进会场，早在角落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便带着4个便衣特务将他逮捕了。

蔡和森被捕后，很快被引渡到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施用各种酷刑。蔡和森横眉冷对，没有吐露半个字。他被打得血肉模糊，被拖回监狱后，还把自己写的诗念给同志们听，表示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

敌人想公开审讯，又害怕社会舆论的指责，便决定用惨无人寰的手段杀害蔡和森同志。这年初冬的一天，敌人把蔡和森同志拖到监狱的墙边，蔡和森同志面无愧色。飞暴的敌人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用刺刀一点一点地把他肉剥下来。蔡和森同志就这样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坚贞的革命气节。

张琦



甩掉个人主义的包袱

我用新党章对照检查自己，感到最大的问题还是不能完全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比如，去年3、4月份，主任外出，车间纪律松散，几次受到厂领导的批评。我和党支部同志商量，搞了几项规定。结果阻力很大，有人要我说“缺点”，听了这些话，就是受夹板气，就没有抓下去。今天，谈出来就是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陈少青

（崔生跃）

大家帮他找“病根”

在政工部门党支部召开的生活会上，党小组长程秀琳带头说：“因委书记小郭工作有魄力，就是不扎实。”工会主席刘云接着说：“我也有同感。就是说得多，做得少。”党支部书记王忠兴指出：“他做得这项工作不如搞管理有奔头。这是私心作怪。”

郭黎明说：“听到这么中肯的批评，是我入党以来的第一次。我要以实际行动回答同志们的帮助。”

古蔺县委召开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

本报讯 不久前，四川省古蔺县委召开有130多人参加的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

古蔺地处四川盆地边缘，是一个与云南、贵州接壤的山区县。这是中国工农红四渡赤水之战辗转迂回的重要地方。红军四渡赤水历时两月，途经九区一镇，给山区人民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三十年代初一大批青年加入了红军，一批青年在外地读书接受了马列主

为了收集党的地下斗争史料和红军

过境时留下的文物资料，古蔺县委邀请一些在全国各地工作的有关老同志，贵州、云南两省有关地区的代表欢聚一堂，收集到2万多字的珍贵资料。有位老党员一次就献出了地下斗争时期的40多份资料。经过这次会议，弄清了古蔺在地下斗争各个时期的斗争史实以及地下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的功劳。

（刘秦宁、梅永生）

解放军理论讨论会在京举行

余秋里要求全军各部队党委和政治机关认真抓好学习
《邓小平文选》，进一步加强部队理论工作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解放军的宣传工作最近在北京举行理论讨论会，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与会同志向会议提交了42篇论文。大家以党的十二大有关精神为依据，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认为，十二大文件关于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是我们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纲领。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

要搞好“四有三讲两不怕”的活动，要提高战斗力服务。在思想建设方面，要强调树立自我牺牲精神和遵守革命纪律等；在文化建设方面，要适应军队的特点和未来战争的需要。既要继承和发扬我军思想建设和思想工作的光荣传统，重视运用历史经验，又要认真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理论。会议在讨论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时，大家认为，科学技术知识是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科学驾驭现代战争能力的重要条件。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个方面的建设，都需要科

学文化知识。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它对理解战争规律、形成指挥能力、掌握作战方式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有些同志还结合当前实际，说明必须进一步肃清在对待知识和知识问题上“左”的影响，推动学习科学文化活动的深入开展。

会上，大家从各个不同侧面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政策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致性。许多同志强调，必须旗帜鲜明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社会主义政策，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一致的。他们还指出，必须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政策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搞好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

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认为这次讨论会开得好。他要求全军各部队党委和政治机关今后一个时期内要认真抓好学习《邓小平文选》，这件大事，进一步加政理论工作，把军队各项建设推向前进。

这次讨论会是总政宣传部召开的。

最近，江苏射阳县黄尖公社新闻村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会——“娘子会”。党支部把新当选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成员的27位妻子请来，让她们谈谈在支持丈夫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和今后的打算。村民们听说召开这样一个会，都拍手称好。

原来，有些干部的妻子手长、嘴尖、事管得宽，有的干脆当了男人的“家”，干部关好过，“娘子关”难过。对此，群众很有意见。按照新宪法选举村民委员会后，人员精简了，大家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村党支部认为，新班子要挑起重担，干部要树立新的作风，少不了家属的支持。于是，就召开了个“娘子会”。会上，第七村民小组组长蔡祝成的妻子陈正秀首先发言：“老蔡常对大家说要遵纪守法，爱护公物，可是，我却趁他上河工不在家的机会，和另外一个女社员合伙搬走了集体厕所里的东西，还把队房后的一棵泡桐树锯走。俗话说：己不正怎能正人，我这样做使老蔡不好张口说人。我丈夫工作，发挥模范作用的‘五项规定’，我可没做到。”

“娘子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摆问题，作保证，越辩越热烈。最后，还一致通过了支持人丈夫工作，发挥模范作用的“五项规定”。

李志勇

别开生面的‘娘子会’

三村民小组组长余井奎的妻子陈树英接口道：“过去我认为自己男人是干部，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去年秋天，因为责任田界址问题，和人家吵得脸红脖子粗。大家说我不管理，一个个不愿和我接近，男人说话也没人听。这个教训我一辈子忘不了。”第五村民小组组长谷子忠了“妻管严”，特别是他搞计划生育工作，回来常被我抱怨。五队的计划生育工作搞了后，这全是我不好，想起来真亏心。常言道，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妻管严’的病还归我来治。”这时，新当选为第六村民小组组长的妻子刘洪芳开了腔：“今天这一课上得太好了，大伙嫂子的发言对我的教育太深了，使我懂得了干部家属应该怎样做道理……”

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为部队输送合格人才

全军院校出现欣欣向荣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记者刘同年、张春孝）记者部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获悉：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各级各类军事院校，现在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正源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

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提出恢复军队院校，把院校建设提高到战略地位的要求以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军院校建设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全军各级领导对院校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出现了关心、支持院校建设的新气象。

——统一了院校和部队指挥院校高中、中、初

他选择了26平方米的住房

河南省南阳建新机械厂党委书记赵可彬同志，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四年老战士，退居二线担任了工厂的顾问。今年6月，厂房产科按干部住房标准，分配

给他80平方米的住房。可是，老赵看到厂里职工住房困难，自己就搬进了26平方米的住房。老赵对孩子说：“咱们有房子住就行了，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

牛合莹

伯德总理离京赴华东访问 赵紫阳总理到宾馆送行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维尔·康沃尔·伯德一行，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今天上午乘专机前往青岛、上海继续参观访问。

赵紫阳总理到钓鱼台国宾馆为伯德送行，祝他在北京的访问富有成果。赵紫阳说，这次访问加深了中安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对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很大意义。

伯德说，我们在访问中看到，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进展顺利，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他表示相信，将来中国发展了，会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赵紫阳希望双方加强交往，在建设各自的国家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国邮电部部长文敏生陪同伯德总理一行赴华东访问。

李梦华赴民主德国访问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体操和体育联合会的邀请，今天离开北京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并参观该国即将在莱比锡举行的第七届体操、体育节和第九届国际青少年体育运动会。

谢拉夫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埃及国庆日

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埃及驻中国大使谢拉夫今天中午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埃及国庆日。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等应邀出席。

藏族有3,870,068人，主要分布在我国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10个自治州、两个自治县境内。

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卫藏、康、安多三大方言。

藏文创制于公元七世纪前期，字体主要有楷体、草体两种，通行于整个藏族地区。

世界屋脊的开拓者——藏族

藏族地区山峦重叠，江河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构成祖国西部表里山河的天然屏障。我国南北两大河流长江、黄河，发源于此；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巍然屹立于中国西藏和尼泊尔的边境。

藏族人民普遍信仰大乘佛教。传入西藏的大乘佛教，吸收了藏族土著信仰本教的某些仪式和内容，形成具有藏族地方色彩的“藏传佛教”。藏族对活佛信仰尊为上人，藏语称为喇嘛，故藏传佛教又被称为喇嘛教。

藏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存藏文为七世纪初根据古梵文和西域文字制定的拼音文字，包括30个字母和4个音节符号，横书右行。有纸帛布皮简牍金石等早期记录文字，通行纸卷和梵夹本，宋代传入雕版技术。著录译述丰富，有佛学、集传和医药、历算等大量书籍问世。元代纂成的佛学典籍从书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语部）、丹珠尔（论部）举世闻名，是藏传佛教对佛学著述整理和研究的巨大贡献，并保存了许多传世古籍残本，计有四千五百六十余部。

藏族历史上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水平。拉萨布达拉宫依山修建浑然一体，累积高达十三层；横跨江河的铁索、藤索桥，均有高超的技艺和独特风格；藏医讲究望、闻、问、切，兼有砭砭、按摩及外科手术；藏药博采动、植、矿物入药，讲求炮制技术，尤对兽医有独到之处。藏历为阴阳合历，近似汉历而有其特点，以五行阴阳配合12生肖系年，每60年一周，以阴火兔年（丁卯）为始年，月有大、小建，一般三年置闰；算学可以预测日、月蚀及地方近期气象。纺织营造和家庭手工业亦很发达。

藏族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藏戏不设舞台帷幕，有小型道具和面具，在乐队伴奏下载歌载舞；乐器取自内地雅乐，兼有寺院鼓钹长号；歌曲种类繁多，旋律奔放，词曲平格相合；舞蹈以踏路舞驰名，书印章法遒严，布局大方，具有东方艺术特色；雕塑技艺高超，色彩鲜艳，为世所重。藏历正月旦日，男女盛装拜年礼佛，预期吉祥如意；4月15日纪念佛诞和唐文成公主入藏的吉日良辰，民间举行庆祝活动；7月秋收之前，农牧民举行歌舞、赛马活动，预祝丰收。

藏族民间习俗质朴。人们习惯上只称名字，人名多取自经典名句。藏族衣着长袍高靴，食物以酥油、糌粑为主，特嗜饮茶；居室有二、三层，开小窗，牧民用帆布或牛毛帐篷。接见宾客时互赠哈达致敬。

解放以后，藏族地方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百万农奴获得彻底翻身解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先后兴建了各种轻重工业厂二百六十余个，其中许多是国家建设的重点项目，工业生产在藏族各地区的经济产值中比重日趋增长；公路交通在通往西藏的甘、川、新、滇等主要干线之间又修通到绝大部分县镇；民用航空

西藏与祖国关系的发展

西藏境内分布着许多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民间流传着各种质朴神秘的古老传说。据说，人们居住在温暖的河谷林间，经过长期的发展，出现了十几个部落，到了七世纪初，民族英雄松赞干布统一全西藏，建成了吐蕃（bo）奴隶制王朝政权，定都逻些（今拉萨），划分军政区域，设官授职，始造文字，创立法制，发展了经济文化。公元641年松赞干布与唐文成公主联婚，为藏族的进步繁荣和祖国各族的团结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在奴隶大起义中覆灭，西藏地区分裂成众多的地方实力集团，逐步缓慢地向封建制度迈进。五代至两宋王朝统治期间，西藏先后形成了十余个较大的地方政权，他们与内地各族和东、北部的藏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发达，诸如茶马互市和汉族的雕版印刷术的传入等。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尊西藏萨迦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后升为帝师），1264年创设总制院（后名宣政院），在各地设立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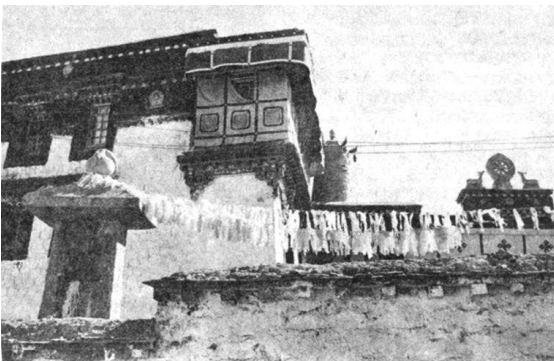
藏清除蒙古汗王势力以后，1728年清朝始派差大臣驻藏办事，1751年建立了西藏地方政府噶厦，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班禅督办西藏地方事务，对于西藏的官制、军制、司法、边防、财政、户口、差役和涉外事宜等，以及达赖等大活佛的转世制度，均作出明文规定。清朝曾先后数次派遣大军入藏，驱除蒙古各部势力的骚扰，击退邻国廓尔喀部的人侵。西藏地方也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奋起抗击英国对西藏的侵略，他们的英雄业绩，载入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的史册。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朝政府对藏族地区的施政体制，在中央设置藏事管理机构，遴选西藏代表参加国会议事，并任命了驻藏办事长官。英国当时对此竭力阻挠破坏，于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谈判西藏问题期间，英方代表

麦克马洪提出划分西藏的草图，遭到民国政府的否认，达赖喇嘛亦表示反对。1919年“五·四”运动经过，激起了举国上下和海外侨胞的反帝怒潮，藏族僧俗领袖亦函电纷陈，强烈谴责英帝国主义在西藏会议上分裂西藏的罪恶阴谋。1934年民国政府派出驻藏办事长官。英国当时对此竭力阻挠破坏，于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谈判西藏问题期间，英方代表

吉坚赞坐床，均循旧制由民国政府拟报审批，并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亲往主持典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等省境内藏族先后获得解放，中央对于西藏问题多次发表声明，提出解决的办法。1950年解放西藏昌都地区，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抵达北京与中央谈判，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签订之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致电中央表示坚决拥护，西藏各阶层僧俗人士和各地藏族领袖也表示热烈支持。协议的签订，为祖国的统一和西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铨



西藏拉萨大昭寺前的“长庆金盟碑”（图左），又称“甥舅和盟碑”或“唐蕃会盟碑”，是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为纪念唐蕃会盟所建，是汉藏两族友好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物。

顾颉刚摄

深入清除“左”的影响 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

北京部队副政委 杨白冰

继续清除“左”的影响，仍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部队在清除“左”的影响、端正思想路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清除“左”的影响的任务还是很重的，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首先要看到，“左”的影响时间长、影响深。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党多次犯了“左”的错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我们一些同志，都曾经长期生活在“左”的环境里，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年轻的同志，都是在这个期间成长起来的，接受了许多“左”的东西。参加革命时间较长的同志，也同样受到了不少“左”的影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许多同志逐渐形成了一些“左”的观念。看问题、办事情习惯于用“左”的眼光看，用“左”的尺子量，用“左”的模式套。因此，系统地清除“左”的影响，进一步解放思想，还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

其次，这几年，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尽管在不断提高，但仍然存在不少模糊认识。有的同志不仅对最近制定的某些政策不理解，甚至对经过几年实践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政策，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疑虑和担心，总觉得同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吻合。为什么至今还存在这些问题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强调了政治态度和政治纪律（这当然是对的），对从思想上拨乱反正下功夫不够。我们必须有在系统地清理“左”的思想上下功夫。没有思想上的一致，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就没有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从部队实际工作来看，“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当前全党全国都在大力进行改革，军队在这方面的任务也很重。我们只有认真地清理“左”的影响，打破“左”的禁锢，才能加快改革的步伐，开创部队改革的新局面。

以上情况说明，清理“左”的影响、端正思想路线的任务，确实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一定要看到“左”的影响的顽固性。对于清除“左”的影响，一定要有很高的自觉性，有强烈的紧迫感。

深刻认识“左”的实质和危害，克服“左”比右好的错误观念

影响我们清除“左”的影响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有些同志总觉得“左”比右好，因此对“左”的东西不敏感，缺乏清理的迫切感和自觉性。

认为“左”比右好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大家常说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些同志所以有这种看法，主要是对“左”和右的含义和实质还不很清楚。我现所说的“左”和右，也就是“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通常是党内指导思想上离开马列主义原则的错误倾向问题。在这里，我们应该严格划清这样一个界限：不能把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同社会上的“左”的和右的思潮混为一谈。所谓“左”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现实，夸大主观力量，把在将来才能办到的事情，勉强地拿到现在来做，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所谓右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甚至企图开倒车。从认识根源来说，

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分不开的。1944年至1945年上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并最后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红军在将德国侵略者驱逐出自己国境之后，乘胜追击，迅速解放欧洲各国，并于1944年9月进入德国。同年6月，英美联军在德国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1944年，美军越岛进攻，接连在马绍尔、加罗林、马利亚纳群岛、塞班岛、菲律宾登陆。1945年4月，美军在冲绳岛登陆，日本本土受到威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特别是德国法西斯投降，大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日本法西斯的垮台指日可待。

可是，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之际，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仍然是腐败透顶，经济上崩溃不堪，以致军队战斗力急剧衰减，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国民党统治区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出现的可耻大溃败，就是国民党黑暗腐朽的一次总暴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到1945年4月，已建立起来的十九个解放区共有正规军94万人，民兵220万人，人口达9,550万。解放区和人民武装不仅成为抗日反攻的主力，并且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能够成为人民的胜利。

当时，中国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大国之一，中美两国是同盟国的关系。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味依赖美国的军火、金钱以及政治上的支持来维持其统治，所以中国仍然处于依附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地位。美国政府的对华方针是：一方面为了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日本和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所受到的军事压力，从1942年以后，即不断地给予国民党政府以贷款、租借物资和训练军事人员等帮助。如1944年2月，

“左”和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都是主观主义的。那种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当然也不能说，每一个有“左”倾或右倾思想的人，不论其程度如何，都是政治立场问题。我们许多人身上的“左”的东西，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有些同志认为，“左”是要革命的，右是反对革命的，所以“左”比右好”。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应当承认，党内犯有“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把革命干好的，但是他们的这种“革命性”，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和偏激的革命要求，缺乏无产阶级的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列宁批评这些人：“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惊人，但是毫无根据”。另一方面，革命事业能不能取得成功，决不是由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关键是看能不能实行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路线错了，主观愿望再好，也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甚至还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不能因为“左”是要革命的，就认为“左”好、“左”正确。对于右倾错误的性质和后果，人们比较清楚。党内的右倾，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严重的右倾会葬送革命。但是，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有右倾思想的人说成是反对革命，更不能把犯有右倾错误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把右倾错误和反革命等同，是把表达党内不同倾向的概念，与表达社会上不同政治力量的概念，严重地混淆起来了。在我们党内有些持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就动起枪来，他们说什么是不革命的。所以，笼统地说“左”是要革命，右是要不要革命、反对革命，是不科学的，更不能得出“左”比右好的结论。

既然“左”比右好的观念是错误的，为什么它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时间那么长，影响的面那么广呢？除了思想和认识上的原因以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建国以后，由于对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缺乏深入的研究，党内生活又极不正常，因而在反对错误倾向中，只反右，不反“左”，而且越反越凶。这样，就助长了宁“左”勿右的思想，使“左”的错误倾向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清除“左”的影响

从思想和工作两个方面清除“左”的影响，应当着重解决好两个问题。

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充分认识党的各项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几年，一项政策的提出，一项改革的实行，在一部分同志中，往往引起一些不理解和怀疑情绪。例如，一讲农业生产责任制，就认为是分田单干；一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认为两极分化；一讲长征贩运，就想到投机倒把；一讲实行奖金，就想到物质刺激；一讲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就怕贬低工农兵，等等。经过几年来的政治学习，特别是实践的教育，大家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怀疑和担心情绪有了很大的程度的解决。但是，有些同志在思想深处仍有疑虑，担心这些政策与社会主义方向不一致，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相符。这种情况说明，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真正弄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与以前的政策到底有什么根本不同，没有掌握衡量政策性质的正确标准。

苏联出兵东北，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立即转入全面反攻的阶段。8月10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军毙俘敌伪23万多人，攻克敌占城市190余座，收复国土31万平方公里，其中热河、察哈尔两省全部解放，其他地区如山西、河北、绥远、山西、豫北、淮北、淮南、苏北、苏中等地，除少数大中城市为国民党抢占外，绝大部分地区均为人民军队所收复。

可是，正当解放区军民对日大反攻时，蒋介石国民党从峨眉山猛扑下来，疯狂地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当时敌伪所占据的城镇和交通要道都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大军却在遥远的西南、西北后方。为了阻止敌伪军向人民军队缴械投降，蒋介石在8月10日发出训令：“命令敌伪驻军司令（冈村宁次）维持现状”，“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民投降”。8月11日，蒋介石给朱德总司令一个命令，要“八路军”“就原驻地维持现状”，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同时又命令伪军“负责维持治安”，甚至宣称伪军为“地下军”，委任汉奸为“司令”。为了抢占战略要地，美国帝国主义派出大批飞机和海船，把长期散布在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从天上和海上运送到敌占区的大城市和进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这样，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又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8月3日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节日。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斗争，蒙受了重大牺牲，仅据实可查的伤亡，人民伤亡即达1,800多万人，军民伤亡数字未在内，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烈、光荣的篇章。

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斗争，蒙受了重大牺牲，仅据实可查的伤亡，人民伤亡即达1,800多万人，军民伤亡数字未在内，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烈、光荣的篇章。

政策的性质发生怀疑，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同志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转变缺乏深刻的理解。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仍然把一些“左”的理论、观念当作真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党的政策，就必然会得出“偏了”、“右了”“倒退”等错误看法。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彻底打破思想上“左”的束缚。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志由于思想方法不端正，也导致了党的政策的性质发生怀疑。他们或者看到了某项政策的完善的地方，或者看到了执行政策中出现的某些偏差、某些消极现象，由此对政策本身发生怀疑。对于这种情况，就不能笼统地说这是由于“左”的影响造成的。这只不过是一个怎样看待主流与支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只要我们的思想路线是端正的，对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认识是清醒的，就能正确看待这些不完善的地方和执行中的问题。

第二，通过清理“左”的影响，为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打好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各部门、各地区、各条战线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清理“左”的影响，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工作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在工作指导思想上清除“左”的影响，必须结合各项工作的具体实践来进行。我们应当通过对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认真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切实纠正“左”的影响，使我们的思想更加符合实际。比如，在有些同志当中，“突出政治”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做政治工作，强调提倡作用不够；抓军事训练，仍然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后勤工作中还有轻视专业、鄙薄技术工作的倾向；对科学文化教育，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得力的措施；在干部使用上，也有重资历轻文化程度的倾向；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那种“一刀切、一阵风、一哄而起”的现象，仍然时有表现。这些都是需要在工作中继续加以清理和解决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

清理实际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影响，要实事求是，我们的工作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有多方面的原因，并不统统都是“左”的影响，不要在什么问题上翻“左”和右。把不是“左”的影响的东西也贴上“左”的标签，反而会把问题搞混乱，使大家无所适从。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要真正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前应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

一是要打破本本主义

苏联出兵东北，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立即转入全面反攻的阶段。8月10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军毙俘敌伪23万多人，攻克敌占城市190余座，收复国土31万平方公里，其中热河、察哈尔两省全部解放，其他地区如山西、河北、绥远、山西、豫北、淮北、淮南、苏北、苏中等地，除少数大中城市为国民党抢占外，绝大部分地区均为人民军队所收复。

可是，正当解放区军民对日大反攻时，蒋介石国民党从峨眉山猛扑下来，疯狂地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当时敌伪所占据的城镇和交通要道都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大军却在遥远的西南、西北后方。为了阻止敌伪军向人民军队缴械投降，蒋介石在8月10日发出训令：“命令敌伪驻军司令（冈村宁次）维持现状”，“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民投降”。8月11日，蒋介石给朱德总司令一个命令，要“八路军”“就原驻地维持现状”，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同时又命令伪军“负责维持治安”，甚至宣称伪军为“地下军”，委任汉奸为“司令”。为了抢占战略要地，美国帝国主义派出大批飞机和海船，把长期散布在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从天上和海上运送到敌占区的大城市和进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这样，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又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8月3日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节日。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斗争，蒙受了重大牺牲，仅据实可查的伤亡，人民伤亡即达1,800多万人，军民伤亡数字未在内，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烈、光荣的篇章。

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斗争，蒙受了重大牺牲，仅据实可查的伤亡，人民伤亡即达1,800多万人，军民伤亡数字未在内，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烈、光荣的篇章。

不大懂得怎样才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可见，如果在思想理论上提高水平，使大家充分认识的现行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很难真正做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有些同志所以对党的政策的性质发生怀疑，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同志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转变缺乏深刻的理解。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仍然把一些“左”的理论、观念当作真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党的政策，就必然会得出“偏了”、“右了”“倒退”等错误看法。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彻底打破思想上“左”的束缚。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志由于思想方法不端正，也导致了党的政策的性质发生怀疑。他们或者看到了某项政策的完善的地方，或者看到了执行政策中出现的某些偏差、某些消极现象，由此对政策本身发生怀疑。对于这种情况，就不能笼统地说这是由于“左”的影响造成的。这只不过是一个怎样看待主流与支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只要我们的思想路线是端正的，对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认识是清醒的，就能正确看待这些不完善的地方和执行中的问题。

第二，通过清理“左”的影响，为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打好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各部门、各地区、各条战线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清理“左”的影响，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工作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在工作指导思想上清除“左”的影响，必须结合各项工作的具体实践来进行。我们应当通过对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认真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切实纠正“左”的影响，使我们的思想更加符合实际。比如，在有些同志当中，“突出政治”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做政治工作，强调提倡作用不够；抓军事训练，仍然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后勤工作中还有轻视专业、鄙薄技术工作的倾向；对科学文化教育，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得力的措施；在干部使用上，也有重资历轻文化程度的倾向；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那种“一刀切、一阵风、一哄而起”的现象，仍然时有表现。这些都是需要在工作中继续加以清理和解决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

清理实际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影响，要实事求是，我们的工作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有多方面的原因，并不统统都是“左”的影响，不要在什么问题上翻“左”和右。把不是“左”的影响的东西也贴上“左”的标签，反而会把问题搞混乱，使大家无所适从。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要真正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前应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

一是要打破本本主义

苏联出兵东北，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立即转入全面反攻的阶段。8月10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军毙俘敌伪23万多人，攻克敌占城市190余座，收复国土31万平方公里，其中热河、察哈尔两省全部解放，其他地区如山西、河北、绥远、山西、豫北、淮北、淮南、苏北、苏中等地，除少数大中城市为国民党抢占外，绝大部分地区均为人民军队所收复。

可是，正当解放区军民对日大反攻时，蒋介石国民党从峨眉山猛扑下来，疯狂地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当时敌伪所占据的城镇和交通要道都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大军却在遥远的西南、西北后方。为了阻止敌伪军向人民军队缴械投降，蒋介石在8月10日发出训令：“命令敌伪驻军司令（冈村宁次）维持现状”，“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民投降”。8月11日，蒋介石给朱德总司令一个命令，要“八路军”“就原驻地维持现状”，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同时又命令伪军“负责维持治安”，甚至宣称伪军为“地下军”，委任汉奸为“司令”。为了抢占战略要地，美国帝国主义派出大批飞机和海船，把长期散布在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从天上和海上运送到敌占区的大城市和进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这样，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又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8月3日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节日。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斗争，蒙受了重大牺牲，仅据实可查的伤亡，人民伤亡即达1,800多万人，军民伤亡数字未在内，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烈、光荣的篇章。

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斗争，蒙受了重大牺牲，仅据实可查的伤亡，人民伤亡即达1,800多万人，军民伤亡数字未在内，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烈、光荣的篇章。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

——《玻利瓦尔文选》——徐葆初



今年7月24日，是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诞辰2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选译的《玻利瓦尔文选》，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玻利瓦尔是委内瑞拉人，他的战斗足迹遍于南美北部和西部，他领导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等地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领导创建了委内瑞拉第二、第三共和国、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先后当选为这些共和国的总统，玻利维亚共和国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人民尊称他为“解放者”。

《玻利瓦尔文选》一书选辑了玻利瓦尔一生的重要著作、演说、政令和书信共50篇。其中重要的篇章，如《卡塔赫纳宣言》、《牙买加来信》、《在安斯特朗国民议会上的演说》、《在玻利维亚制宪议会上的演说》等，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这是一部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

玻利瓦尔毕生献身于拉美独立的伟大斗争，尽管道路曲折，不断出现反复，他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斗争，直至把西班牙殖民军逐出拉美大陆。1812年，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遭到扼杀，玻利瓦尔来到新格拉纳达的卡塔赫纳（今哥伦比亚境内），以此作为基地和远征的出发点。他在《卡塔赫纳宣言》中，总结了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自身政体的软弱和队伍内部的分裂是导致第一共和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且表明自己的决心：“我矢志不渝，忠于祖国所向往的自由和公正的制度。我来到卡塔赫纳，是为了继续高举在我国各州的上空光荣地飘扬的独立旗帜。”他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以后，提出了斗争目标，制定了一套克敌制胜的策略。在他领导下，1813年8月解放了加拉加斯，成立了第二共和国。但是，1814年第二共和国又遭到失败，他在《卡鲁帕绍宣言》中，分析失败的原因，阐明自己的责任，并且发誓：“不管我是解放者还是死去，我将永远无愧于你们给予我的荣誉，地球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使我已下决定去要继续下去的历程停止下来”。1815年，玻利瓦尔流亡到牙买加，发表了有名的《牙买加来信》。他在这封长信中，深刻地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和压迫，他说，

拉美人民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最正义的，从结果来说，是最合理的，从古代到现在所进行的所有斗争中最壮丽的和最现代的”，他深信这场斗争“最终必将胜利”。所有这些，都显示了玻利瓦尔在失败面前毫不气馁的英雄气概。

玻利瓦尔是拉美民主共和制的奠基者。他反对君主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政治主张，在早先的一些著作、演说中已有论及，而在1819年《在安斯特朗国民议会上的演说》中阐述得更明确。他说，“委内瑞拉政府过去是、现在还是、也应该是一个共和政府。它的基础是人民的主权；三权分立，公民自由，禁止奴隶制，取消君主制和特权。”他的这一政治主张得到采纳。这次国民议会通过的委内瑞拉新宪法和1826年制定的玻利维亚第一部宪法，都强调人民主权是立国的基本原则。玻利瓦尔主张废除奴隶制，关心给印第安人以平等权利。1825年，他在秘鲁以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和秘鲁共和国最高执政官的职务，颁布了《关于印第安人权利的法令》和《关于给印第安人分配土地的法令》。玻利瓦尔还在几次通信中，严词拒绝某些人要他称帝的建议，坚决反对建立君主制。他的这些政治主张及其实践，对于拉美独立运动的胜利，对民主共和制在拉美各国的确立和巩固，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玻利瓦尔是拉美团结和联合这一光辉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牙买加来信》中，他清醒地看到“因为不同的气候、各种各样的形势、对立的利益、迥异的特点使美洲四分五裂”的情况，但他认为拉美各国毕竟“有着共同的遭遇”，指出“只有团结才能驱逐西班牙人”，1819年，他发出了响亮的号召：“团结，团结，团结，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就是根据他的意见建立的；后来他又提出由大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组成联邦的方案；1826年，他提出《关于巴拿马大会的设想》，主张“结成迄今为止全球最广泛、最卓越或最强大的联盟”。虽然由于历史条件不具备，后来大哥伦比亚分裂了，美洲大联合的局面也没能实现，但玻利瓦尔拉美团结联合的思想依然光彩熠熠，今天仍在激励拉美人民沿着团结的道路去争取新的胜利。

中国与拉丁美洲各国同属第三世界，中国人民和拉美人民有相同的遭遇和类似的斗争经历。《玻利瓦尔文选》的出版，对于增加我国人民与拉丁美洲人民之间的了解，增强相互间的友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